

断裂社会的知识分子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062)

摘要: 无论重返中心, 还是落入草根, 都不过是传统士大夫的回光返照, 所谓的缙绅或游士只不过是士大夫精神的两面而已。从传统士大夫走向现代知识分子, 所要引入的, 却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 不可能产生于四民社会, 也难以在“断裂社会”中蕴育, 它需要的是健全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 而这些正是知识分子社会转型的制度化平台。

关键词: 断裂社会, 知识分子, 士大夫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 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最起伏动荡的岁月。短短的一百年, 经历了大清王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朝代, 从政治军事到社会文化, 都发生了此前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 这是一个大时代。

在这样的大时代里, 一切都在变, 都在时代的海啸中被淘洗了一遍。那么, 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人, 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简单地说, 他们面临着从古代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大转型。这一大转型, 既是一次思想史意义上的价值转变, 也是一个社会史层面上的身份、地位和角色的转换。关于前者, 我在 2000 年编选的《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中, 已经有所阐述, 而本书的编选, 则侧重于后者, 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这次大转型, 以及在大转型过程中社会政治与文化思想的互动。

传统的中国社会, 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四民社会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 乃是一个伦理本位, 职业分途的社会。士农工商这四大阶级, 形成了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分层。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不同, 四民社会的等级分层, 是上下之间有流动的社会分层, 作为社会中心的士大夫阶级, 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精英, 保证了精英来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 也维持了社会文化秩序的整合和稳定。

士大夫阶级, 在古代中华帝国, 是帝王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其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 士大夫阶级所信奉的道统——儒家价值观既是帝国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 也是宗法家族社会共同的文化传统; 其二, 士大夫阶级(亦称为士绅阶级)一身兼二任也, 在朝廷辅助君王统治天下, 在乡野为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领导民间。以士大夫阶级为重心, 古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浑然一体, 表现出有机的整合。

明代以后, 这一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 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 虽然还是在士之下, 但已经在农工至上。到了晚清, 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抵抗外国列强的需要, 出现了地方士绅领导的私家军, 本来一直被压抑的军人集团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 渐渐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军人和商人地位的上升, 士农的位置急剧滑坡, 特别是士大夫的核心位置, 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激烈的社会大动荡之中, 四民社会逐渐解体。

不仅四民社会解体了, 而且士大夫阶级也被彻底颠覆了。一百年前的 1905 年, 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 自此, 士大夫阶级失去了其制度化的再生机制, 只剩下其无形的灵魂, 不

复其有形的躯壳。士大夫阶级没有了，然而读书人还是存在，他们摇身一变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晚清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大夫相比较，有诸多的不同。首先是知识结构变化了，从四书五经变为亦中亦西的新学，从伦理政治的规范性知识变为应用性的自然知识；其次是知识的空间变化了，从过去的私塾、书院变为中西混杂的洋学堂，到民国以后又变为西方式的以学科化为中心的 school 体制。最后是读书人的出路变化了，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仕途一条路，他们与国家的制度化联系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被切断了，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精英，他们成为了自由浮动资源，开始流向社会：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媒体、出版业和学院，也有一部分生存在社会正式结构的边缘和外围，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现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而是一个无中心的“断裂社会”。所谓“断裂社会”，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是国家与社会的断裂。士大夫原来扮演着将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枢纽功能，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大夫阶级瓦解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再也无法建立起制度化的沟通，二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断裂。精英流失到民间，流失到社会各个领域，导致国家统治集团的非精英化。军人干政，武人弄权，大批边缘人物借助枪杆子和私人关系，进入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各级统治机构，导致政治黑暗腐化。国家权势与散布在社会的商业精英、知识精英和媒体精英发生了日益严重的紧张和冲突，最后在分崩离析的大乱局中，边缘知识精英领导农民，进行了一场由上而下的社会大革命，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

“断裂社会”的第二个涵义是社会各阶层的断裂。在原来的四民社会中，以士大夫阶级为核心，士农工商之间存在着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和上下流动的有机联系。到 20 世纪以后，随着士大夫阶级的消亡、农民阶级的凋敝以及商人和军人地位的上升，阶级与阶级之间断裂了，社会不再有中心，彼此之间也缺乏制度化的有机联系。这种“断裂社会”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现代的多元社会，因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分化，社会分化为不再有中心的多元社会。但“断裂社会”与此的最大区别在于：在多元社会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各个领域之间以及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基于合理的分工和分化基础上的有序联系，而分化了的秩序又是被制度化了的。但在“断裂社会”之中，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由于缺乏公共的价值观和制度基础，无法形成有序的联系，也缺乏稳定的制度化分层结构，而是呈现出一种无中心、无规范、无秩序的离散化状况。

在这样一种“断裂社会”的乱局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和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在传统社会中士大夫阶级与国家和社会的有机联系，如今都崩溃了。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现代的知识分子与国家不仅失去了内在的体制关联，而且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另一方面，大批知识精英离开家乡，离开乡村，进入都市，又意味着他们脱离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血缘、地缘和文化之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枢，如今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而且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

不过，进入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知识分子，虽然失去了土地，却获得了天空，那就是现代社会中属于知识分子的知识空间：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学术社群以大学为中心，辅之以基金会、学术社团和同人刊物。它们属于知识的生产领域。而文化传媒则属于知识的流通领域，由报纸、杂志和出版业组成。无论是学术社群还是文化传媒，这些相对独立的知识空间都是古代中国没有过的，或者说不曾以建制化的网络规模出现过。这是现代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空间。尽管如此，学术社群也好，文化传媒也好，它们都不再是社会的重心所在，与此同时存在的，还有以市场为核心的商业社会和以权力为核心的国家系统。事实上，随着商人和军人地位的上升，国家和市场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学院和传媒，并且权力和资本的力量也不断渗透到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领域，使得其无法保持应有的自主性。

当知识精英有了自己的小社会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时，也使得他们失去了与国家与社会的有机联系。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变得象征化和符号化，只是以知识的符号形态影响社会，

通过抽象的话语方式启蒙民众。知识分子与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这种的象征化的联系，背后所缺乏的，正是过去士大夫阶级那种制度化的渊源。而抽象的话语一旦匮乏建制化的基础，就会变得无足轻重。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不再是社会的中心，反而在“断裂社会”中愈趋边缘。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使得知识分子内部也发生了断裂。一部分知识分子，从梁启超、严复到胡适、丁文江、张君勱、张东荪，怀着传统士大夫的梦想，力图通过言论和知识的力量，重返社会的中心，并希望将社会与国家通过西方式的改革，重新整合起来。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从章太炎、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则利用“断裂社会”的缝隙，自居社会的边缘，反叛体制、反叛主流，在社会建制之外发动革命，导演了 20 世纪两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大革命和社会大革命。最后，草根政治战胜了士大夫政治，边缘知识分子战胜了学院知识分子，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建立起来了，在这样的列维坦里面，不再有社会，也不再知识分子。

直到 20 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当社会重新从国家中解放出来，知识分子也重新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但很快地，一个世俗的工商社会崛起，使得知识分子重新边缘化，重新变得微不足道。这一次，他们不是被国家颠覆，而是被社会本身颠覆了，确切地说，是被市场社会埋葬了重返中心的梦想。

无论重返中心，还是落入草根，都不过是传统士大夫的回光返照，所谓的缙绅或游士只不过是士大夫精神的两面而已。从传统士大夫走向现代知识分子，所要引入的，却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不可能产生于四民社会，也难以在“断裂社会”中蕴育，它需要的是健全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而这些正是知识分子社会转型的制度化平台。

the Intellectuals of Departed Society

Xu Ji-lin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Whether the intellectuals went back to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society or fallen down to the verge ,the situation expressed the struggling of traditional scholar-bureaucrat. So-called gentry or floating intellectuals are the two hands of the spirit of scholar-bureaucrat. During the course of from traditional scholar-bureaucrat to modern intellectuals what to be added is the civil consciousness of modern society. Civil consciousness can not appear in the Si-Min society as it can not be raised in the departed society. What it call for is healthy civil culture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which are the system ground to help the social transferring of the intellectuals .

Key words: departed society ,intellectuals ,scholar-bureaucrat

收稿日期: 2005-12-31

作者简介: 许纪霖，汉族，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